

大墙丛书

报告文学集

润物细无声

柯岩主编



润物细无声

大墙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群众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润物细无声

大墙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25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664-2/I·203 定价：5.00元

印数：00001——12000册

《大墙丛书》序

柯 岩

犯罪是世界性问题，是除了战争之外，给世界造成巨大灾难及痛苦的人类行为。因此，整个世界都不能不为之忧心忡忡，为谋求制止和解决犯罪问题而竭尽心力。

惩罚，曾被认为是制止犯罪的唯一途径。为了减少罪犯对社会危害的可能性，人类建立了监狱，制造了死刑、监禁、流放……种种使犯人与世隔绝的惩处方式。

于是，在人类正常的社会之外，又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一个被大墙隔绝、禁锢的世界；一个对于普通人说来，充满罪恶与神秘、令人厌恶却又极度引发他们好奇心的领域。

此外，罪犯同时又是人，有着人俱有之的种种人际关系——父母、配偶、子女、亲友……与之对应，还有被害人的父母、配偶、子女、亲友……因此，这个被禁锢的世界，不可能不牵动着正常社会中千家万户的神经，激动着他们的感情，改变着并塑造着这千千万万人们的生活与心态。其事件及情节的千变万化，因果关系的错综复杂，人性和性格的扭曲变态，感情和理念的异乎寻常，反过来，又必然重新影响与作用于社会，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的焦虑与关注。

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正因为大墙内外的这种隔绝与不隔绝，这种被迫与自愿；这种铁与血、骨与肉；这种切断又千丝万缕的相联相关，描写罪与罚、虚构与实写和大墙独特生活有关的作品，从来拥有广泛的读者面，能调动各个阶层读者的积极性。无

论它是真正具有价值的还是粗制滥造的；甚或无论它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为此，我们，北京市关心青少年教育协会，决心履行自己应尽的义务。为了如实地展现大墙内外的生活，为了留下时代的脚印，更为了正确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向中外读者介绍中国，社会主义中国是怎样处理犯罪问题的，是怎样对待犯人以及为什么要如此对待的原因，我们结合我国公、检、法的现实，邀集了各方面有关的专家学者，组成了一个庞大的编委会，着手编写这套《大墙丛书》。

我们的能力也许是微弱的，但我们的心是坦诚的。我们希望这套丛书不仅能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心理，而且能够产生比较实际的影响：使已经伏法认罪刑满释放的朋友坚定信念，在新的人生道路上脚步矫健；使正在服刑的人们看到希望和方向，从而获得勇气和力量，彻底和昨天告别；我们更希望它能对正徘徊歧路或对法律几乎无知的青年朋友（以及他们的师长、亲友）起到防微杜渐、预防犯罪的作用。

这套丛书，将以报告文学、小说、散文、戏剧、通讯……种种体裁的专集陆续问世。不论哪种体裁，我们都将要求它既是文学的，又是真实的。

中国对待罪恶的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我们相信，读者诸君可以从我们这套丛书中得到回答。这里，请允许我先摘引一点资料：

1984年5月14日—18日，联合国在中国北京召开了世界“青少年，犯罪与司法”专题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政府改造、教育、挽救、造就人才的劳改政策受到外国司法界的一致赞赏。美国首席大法官称赞中国的监狱是“围墙工厂”。

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专家对社会治安及犯罪问题，结合中国国情而提出的“综合治理”方针，引起与会的五洲十七个国家专家的重视，并普遍为联合国成员所接受，承认它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东方经验”。是中国的独创和贡献。

这是一次严肃的国际学术会议，与会代表不仅专业知识精湛，而且见多识广，能得到他们的首肯，靠的不是溢美之词，而是材料、事实、理论和数据。

世界上有千千万万的社会学家、犯罪学家、人类学家，为什么不是他们，而偏偏是我们中国，这个在科学技术上还远不发达的中国，超越了几千年人类社会对罪犯仅仅是惩处的界限，提出了改造、教育、挽救、造就人才的劳改政策和综合治理的方针？我想，这是由于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正如众所周知，犯罪这一概念是一个具有阶级性的概念。不同性质的社会，不但有着不同的社会内容，也必然有着对待犯罪的不同刑律与方法。封建社会，可以因一个人犯上而诛九族；《悲惨世界》告诉我们，冉·阿让因饥饿仅偷一块面包就被判终身苦役；而“无产阶级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察事物，承认矛盾可以转化，创造条件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哲学思想指导下，我国的劳改政策及战斗在公、检、法这条战线的同志们，创造了这中国式的奇迹。

我们为能向世界展示这些奇迹而感到自豪。我们更愿为我们这套《大墙丛书》能赶上并超过目前我国已获得世界声誉的、改造末代皇帝溥仪的那本奇特的书《我的前半生》的思想水平和艺术水平而努力奋斗。

如果我们的努力能使中外读者多少加深一些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与理解，那将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热切地期待着广大专家和尊敬的读者们的教正。

目 录

写在大墙上的业绩·····	田珍颖 (1)
“芳草地”的芳草·····	傅溪鹏 (60)
润物细无声·····	杨肇林 (74)
天堂河里“女儿国”·····	卢晓渤 (109)
伪病故事·····	李忠效 (132)
寻找梦中的世界·····	刘 览 (156)
为无名者剪影·····	樊庆荣 (187)
主持超度的人·····	刘 爽 (201)
片警的故事·····	杨 英 (219)
周德祥和“三祥们”·····	梁宝宽 (226)
亲 情·····	张忆群 (239)
来自大墙内外的报告·····	杨洪坛、李秀贞 (256)
后记·····	薛文璞 (284)

写在大墙上的业绩

——北京市监狱采访纪实

田 珍 颖

大墙，电网，封锁着一个神秘的世界。

指着大墙深处，北京市劳改局局长魏相如对我说：“这里，正在进行一项工程，一项改造人的工程，把丑恶的变成美好的，把有害的变成有用的。”他神情深沉，“这项工程，浩繁艰巨，但它造福于全社会，全人类。”

于是，这神秘世界的大门，向我洞开。

北京。自新路。

一个不大的农贸市场，横亘在这条并不繁华的街上，整日市声鼎沸。

转过这街市百米之遥，迎面陡立的大墙，肃目凝神的持枪警卫，豁然大开的铁门，仿佛扫尽市声，独占一片静穆。

这就是北京市监狱的所在。

大门之内，花草扶疏，绿树茂密。灰色的大瓦高房，黑红色的门窗，以及来往匆匆的穿警服和着便装的警官们，显示出办公区域秩序井然。环视四周，那格局规整的房屋上，几束摇曳的野草经风沐雨。这里许多建筑的最早标志，应当追溯到1909年（宣

统元年)。也许你极想越过这办公区的高房，去寻访这大墙之中占地1131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的其它所在，去探求那534名穿警服者和两千多名穿囚服者的神秘世界。

办公区的东侧，另一扇红色铁门，又一个持枪的警卫战士，封锁住一个并不封闭的世界。这扇铁门是办公区和监区之间的唯一通道。铁门后，五米远的路面上，一道白色直线，标志出“警戒线”三个白漆大字，犯人不可逾越此线。

这道白线之内，才是那个令人莫测的特殊所在。

北京市监狱有记载的数字表明：

1949年，收押犯人2674名，释放603名；

延续至今的40年间，平均每年收押犯人1300多名，释放370多名；

收押犯人最多的1955年，为4184名；

释放犯人最多的1950年，为1691名；

累计推算，解放后至今，在这里服过刑的犯人已过50000人。

北京市监狱建制严格而齐全。

刚入监的犯人，要先到入监中队学习监规，端正态度，然后才分到中队去。十个中队和一个女犯中队，构成了监狱中改造学习、生产劳动的实体。各中队中拒绝改造并扰乱中队正常秩序的犯人，被送到严管中队进行教育。到这个特殊中队的犯人，虽然因反省错误而不参加劳动，但也同时被取消了对家属的接见，不能接受家属送来的食品衣物，不许抽烟，取消每天一顿细粮的伙食改善，直到他们有了悔改表示，方可送回原中队。

犯人中的“反改造的尖子”，或滋事打架分子，或企图越狱者等等，经过监狱领导批准，可送反省号。这个全监狱的特殊所在，对犯人有着无形的威慑作用。走进这个监管严格的小型甬道，才看到名副其实的铁窗——像电影中所见到的那种铁栅。监号里简单地摆放着一个简陋的铺板和一个装污水的加盖塑料桶。监禁

在这里的犯人，罪行严重而又不服罪者，要戴上镣铐。这里的犯人，不能随意交谈，但可以在各自的监号里看书，学习，反省罪行。

除了以上的建制，犯人也组成了伙房中队，修建队，缝纫队等，从事专业性的劳动。

十个建制严格的中队和女犯中队，每队一百多名犯人；每个中队有自成一体的甬道，教室，和被称之为“三角地”的活动场所；每个中队属下，又分成几个小队，便于管理和开展活动。犯人们除了参加生产劳动要到车间外，其余的时间在甬道范围内活动，不能逾越。十二人一个屋子的监号，也在甬道内，其间，被褥整齐，一应物件都有规定的位置，参观者往往叹之为“军营”。

严格规定却又多种多样的活动，为犯人们的服刑改造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而要使几千名犯人在这里脱胎换骨，却要度过一个艰难跋涉的历程。

当然，我们曾经有过改造末代皇帝的成就。但，那时历史已给皇帝画过了句号。而如今，那掩在囚服下的几千颗活蹦蹦的心，却拽着时代风云的影子。绿色的大墙，你将如何铲除那根深如磐的丑恶，去翻新出一个真善美来？！

带着对犯人采访的沉重感，我急切地去追寻那些绿色的光点。我知道，他们默默地负着重担，开辟着一条条新路，共创这大墙内外前无古人的事业。

于是，我看到了一个个灿烂的青春，一颗颗比天空广阔的心灵……

没有奇迹，只有平凡

几位监狱长的日程表满满的。我难以追赶他们的脚步，于是，

我只能从警官们的叙述中，从犯人们的描绘里，从监狱长们匆匆留给我的片言只语，去构写监狱长们的故事。

当我问起监狱长们在大墙内的工作时，他们众口一致地选择了一个词：平凡。

监区里，一个眉目慈祥的老人经常出现在各处。尽管他眉宇间并无凛然之气，但他走到哪里，就把威严带到哪里。他就是现任北京市监狱监狱长，年已花甲的邢中和同志。在这所清末筹备由日本人小滋次郎设计建成的监狱里，若抹去政权的性质的界限，按时间连续计算，邢中和应当是这座监狱的第三十任监狱长。近八十年沧海桑田，风雨嬗变，这座监狱的大墙上，潜留着多少历史的印迹。

解放后，在百废待兴之际，北京市监狱在史册中新的一页上，写下自己的新生。一批穿着灰布制服的干部，分配到这座监狱，他们大多带着战场上的硝烟。那时，他还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1946年在河北参加解放军，攻打察哈尔的战斗中负伤。1956年隆冬，他带着左腿的终生残伤，到北京监狱报到。当年雄姿英发的邢中和，而今已白发染鬓。当年，他从填写犯人卡片的细微工作起步，如今领导着这座中外闻名的监狱。他在大墙内送走了的那一万四千多个白昼黑夜，记录了多少由他演化的故事。倘若问他这曲折而漫长的经历，只能换得他淡然一笑。而说到他领导下的534名干部，他会明确地告诉你：北京监狱的稳定，全在于一批中小队长们尽心尽力的工作。接着，他颇为动情地说：

“去年，干部体检，去了400人，23%有病——近100名啊！胃病、高血压、神经衰弱，有的才五十多岁，就因病故去。”他用了“故去”这个词，许是回避那“死”字的残忍。

作为监狱长，大墙内的人人事事都和他相关相连。他先谈到了对犯人的严格管理。然而如果监狱工作仅仅是严格管理，这和古

今中外的监狱是没有区别的，真正的区别是他下面的话，他强调说，犯人是可感化的，不能整犯人，要给犯人希望，才不会使矛盾激化。他讲了这样一件事：有几个犯人想结伙逃跑，为排除障碍，他们议定要杀死值班干部。杀哪次值班的？犯人竟颇费思考，因为“干部们对咱们都不错”。

在邢监狱长管辖下的北京市监狱，管教干部不仅不许打骂犯人，连讽刺犯人在禁止之列。中队办公室里有电棍，有手铐等械具，但不到万不得已绝不许动用，即使急需使用时，也要向监狱领导请示。

谈到工作时间，邢中和微微一笑说，常年住办公室，习惯了，这里的干部，没人提“八小时”。

邢监狱长的身影会随时随地出现在监区内。

他发现一个犯人独自走向监狱医院，会立刻叫住，询问为什么没有管教干部跟随；

他在接见日常常出现在接见室，默默地察看家属带来的食品，研究物价上涨对犯人生活的影响。

1987年，接近年关时，监狱上下忙碌不止。1月15日晚上，六中队的犯人刘仁义正在值班。邢监狱长巡查到了这里，从刘仁义身边走过。当他已走近大门时，又回转身来，仔细察看着刘仁义的脸色，问他是不是病了。刘仁义说队长已带到医院看过，没检查出病因。邢监狱长一边嘱咐刘仁义“要爱护身体”，一面告诉六队的干部，要尽快地带他再去医院检查。”平时能说会道的刘仁义，此时竟说不出一句话来，只能不停地点头，不停地擦拭着眼泪。

慈祥与威严，和谐地在邢监狱长身上溶汇，这并非奇迹。只因为他必须用双臂和他的同事们一起支撑着这巍然大墙。

副监狱长徐继庄，正值年富力强。但他已毫无例外地有着监

狱里警官们日夜操劳的疲惫之色。他严肃中透着睿智。

他是全监干部中唯一的一名“文革”前毕业的大学生。令人意外的是，他的专业并非社会科学，而是化工。但是，当1963年他走出大学校门后，没有去厂房高大的化工厂，却来到了这座用大墙封闭的监狱。后来和他同时分配来监狱工作的十多名大学毕业生，陆续调走。但是，他留下了。一留就是28年。时间无情地带走了他的青春。

在监狱的塑料厂里，他发挥着专业特长，倒也自如。他看着那个当年设备简陋的车间，如何变成今日的机器轰鸣。当副监狱长的担子落在他肩上时，他几乎来不及犹豫，就担着这付重担，走他中年的路。

几年前，他和另一名副监狱长王福涛曾组织了女犯的座谈会，有人曾把这次会称作“对话”。会刚开始，气氛沉默。犯人不习惯面对面地和监狱长们讲话，一再鼓励，犯人们仍你推我搡。终于，有个入监前是工程师的犯人开了头。她说：“女犯人洗漱，一年四季都在院子里，能不能有个盥洗室？”说毕，犹疑地看着两位监狱长。其它女犯，无人呼应，都在心中嘀咕：提这要求，不挨批吗？可是，徐继庄平和地说：“这个意见很好，监狱领导已经注意了这个问题，并做了研究。”王福涛也说：“已经决定拨款，在女监衙道里建一个盥洗室。”

不久，那新建的盥洗室里，水声哗哗。

我曾就这个问题和徐继庄交谈：“犯人们这种要求不过份吗？”

他温厚地一笑，说：“对犯人也要讲人道主义。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改善犯人的生活条件，是有利于改造的。”

“就说现在接见家属时送的东西吧！高级烟、熟肉、高级糖，应有尽有，以致出现了‘囚犯不吃囚粮’的现象，这个现象不正常，但这问题很复杂。犯人的伙食费原来由国家发22元，监

狱里再补助4元。但现在物价涨了，伙食的质量就难提高。我们现在正设法解决这个问题。比如：粗粮细做，精打细算。但，也必须限制家属送食品的数量和品种，囚犯就应当吃囚粮嘛……。”说这些话时，他微皱眉头，颇费思考。二千多名犯人的一日三餐，在徐监狱长的心中，是块多么沉重的石头！

两年多前，随着犯人文娱活动的开展，女犯中有人试探着问：能不能作健美操？能不能跳舞？

对这个问题，监狱上下意见不一。有人说：犯人来监狱是服刑改造的，有什么必要跳舞？也有人说：开展多种文娱活动，有利于改造。这个问题向徐副监狱长提出时，他说：对美的追求，人皆如此。我们的任务，是使犯人真正区别美与丑，在挖除丑恶后，塑造一个新的灵魂，让犯人接受真善美熏陶，感受文明，只有利于改造，跳一跳健康的舞蹈，有什么坏处？

后来，北监参加《复苏心灵演出团》的节目中，女犯演出了舞蹈，她们的腰肢胯臀的摆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大惊小怪。

或许由于徐继庄对这些问题的表态，都颇有文化味儿，女犯中就有人又向他提出是否允许抽烟。这个问题在男犯中是不存在的——男犯可以抽烟。徐继庄并不赞成女犯抽烟，但他只悠然地说：“抽烟问题，似乎也应男女平等。但是，从形象，从气质风度上说，抽烟对女性，总不是很美好的吧！”

犯人王林的陈述，使我意外地发现了徐继庄隐在严肃背后的醇浓的人情味儿。

王林，48岁，原为某化工厂的工程师，贪污罪已使他在铁窗下度过了三年多的岁月。许是由于都是学化工的，徐继庄特别关注王林在监狱塑料厂的技术工作和他的改造。王林留在大墙之外的，是一个破碎了的梦——和妻子离婚了，孩子都判给了妻子。他万万没想到，徐监狱长竟在去他原单位办事时，亲自找他离了婚的妻子谈话，王林向我讲述到此，已是热泪盈眶。

王林的妻子，开始并不愿意和徐继庄谈话，但她最终被这位警官的诚恳所打动，向这位从不相识的监狱长倾诉了内心的痛苦。徐继庄向她讲述了王林服刑改造的情况，希望她能虑及子女，接受王林的悔悟。他从她的犹疑不决中，看到了一线希望。他把这一线希望带给了王林。那一夜，王林辗转反侧直到天明。

后来，王林原工厂的领导，有感于监狱干部改造犯人的精诚之心，表示要保释王林，为协助监狱改造犯人也尽一份社会责任。

犯人王林是流着热泪讲述这个故事的。那热泪里，映出副监狱长徐继庄一颗炽热的心。

韩士章的名字，我是在美国《时代周刊》上看到的。那上面附着他一幅照片，照片上的他，眼神冷峻。及至在他的办公室和他相对而坐时，从那漾出的笑容里，却寻不到照片上的冷峻了。

51岁的副监狱长韩士章，精神奕奕，办公桌上，端放着一台监视器，这显示了他的权力，也标志了他沉重的责任——监狱围墙四周及部分车间的情况，随时显示在屏幕上，他也把一颗心系在这屏幕上。

这个从18岁就穿上警服的副监狱长，至今已在劳改战线上工作了33个春秋。

他目前分管全监犯人的管教工作。“文革”结束时，他曾参加了局系统落实政策的工作。他亲自动笔为200名无辜者写下了落实政策的文字结论。目前，面对犯人，他说：“我们执行政策是一切工作中首要的。周总理生前说，不许打骂虐待犯人，并要求我们将此项条文向犯人公布。我们公布了，犯人就可以监督我们，犯人有权控告违反政策的干部。”

犯人刘双全控告干部一事，就是由韩士章参加处理的。刘双全在违犯监规后，被一位小队长用绳子捆住双臂，几小时后绳子

解开时，双臂麻木，几经送医院治疗，均无明显疗效，加上犯人有情绪，不配合治疗，终于一臂在一年后肌肉萎缩，监狱处分了这个小队长，不久又调离监狱。犯人刘双全在调到延庆监狱后，向检察院提出控告，韩士章协同有关部门处理此事。他耐心地听取了刘双全的意见和要求。但当刘双全得知对小队长的处理后，说：政府已经处理了干部，我还有什么可说的。

说到这件往事，韩士章有些激动，他说：“管教干部如果执行政策，就代表政府；如果不执行政策，还有什么资格代表政府呢？”

站在韩士章家的阳台上，恰能俯视监狱的围墙。分这套房子给他，或许正是考虑到他工作的特殊。这样，如果当晚他能回家休息，那么，回家后最重要的事，是在夜幕将合时，检查监狱围墙上的灯光。倘若发现那距离均等的灯光少了一个，他就立刻拨通监狱的电话。如果遇上刮风下雨，他从家里望着那灯光，坐卧不宁——这是犯人越狱的最佳天时，有时他索性顶风冒雨地赶回监狱去。他家距离监狱只五分钟路程，但是，在1989年夏季的动荡中，他和监狱其它领导一样，20天没回家。

“我们的工作，是坐在火山口上。”韩士章说着，从办公桌上抽出一把森森闪光的匕首。我不由一惊。他掂着那匕首说：“够磨刀霍霍的吧！”办公桌上，放着审讯制造匕首的犯人的记录。这个叫李全育的犯人，入监不到三年，是从死缓二年改为无期徒刑的，他利用监狱车间的原料、机器之便，偷偷打磨了这把匕首。

韩士章又抽出一把小菜刀，这是他巡查时从一个不引人注意的地方发现的，旁边还有一个小菜板。

他收回这些凶器，长长地嘘一口气说：“我们的工作，辛苦，艰巨，还有风险。但是，人，总得有些奉献精神，有奉献，才有社会的前进。”

我未能访遍所有的监狱长们，但他们在改造人的事业上的总体形象是奉献。当我为他们这种无私的奉献深深感动时，他们却看得极为平常。他们淡淡地说：天天如此，太平常了。

但，宏伟的事业，并不由奇迹编织。平凡，才是它的经纬。

监狱记住了他们的名字

他们，一身警服，一身威严，却掩不住那日渐增多的白发。你在监狱的许多岗位上都能见到他们。他们几乎都是在这大墙内不知不觉地染白了鬓发。

身材魁梧、神情严肃、坦率刚直的张大宽，是他们之中普通的一员。

他不是名声显赫的先进工作者和立功受奖者，但他坦荡的内心，十几年如一日的作为，会使你看到北京监狱许多轻荣誉重实际的警官们的胸襟。

52岁的张大宽，是全监仍在第一线与犯人打交道的中队干部中，年龄最长者。这位五中队的指导员，精神矍铄。他每天早上五点半起床，六点给犯人点名，然后带他们列队进车间。这一整天里，他就在车间、衢道、办公室之间穿梭往来。晚上十点钟，才是他下班回家的钟点。他记不清这么多年来多少个节假日不在亲人之中，而在犯人之间，他也从未界定过哪些时间算是他加班加点。就这样，他1972年，带着“文化革命”中的挫折来到北京监狱当中队指导员，至今已16年。此间他没有提过工资。这个已有34年工龄，30年党龄的老同志，若按国家行政级别划分，至今不过是个“副科级”。对此，他说他很难有怨言，因为在他周围许多的同龄人，也如同他一样超负荷工作着，却所得甚少。